**《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2期（总第10期）目录**

**◆卷首语**

科研人头费不能变成“提成费”**（熊丙奇）**

**◆高层要论**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

**◆本刊特稿**

全面从严治党 为建设区域性高职名校提供坚强组织纪律和政治保证

——在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家健）**

**◆两学一做**

论“两学一做”的战略意蕴**（李拓）**

全面把握“两学一做”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曲青山）**

**◆教育视点**

我们该怎样办大学**（张尧学）**

大学的价值是让学生更有智慧**（席酉民）**

“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储朝晖）**

**◆内涵攻坚**

经济社会转型期应彰显尊重“工匠精神”

——《大国工匠》纪录片对职业教育问题的深度折射**（聂伟）**

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未来**（尹绪忠）**

撬动现代学徒制的支点是“利益”**（王喜雪）**

高职院校如何“精准”优化专业设置

——关于中国特色“双三元”职教模式的思考与探索**（刘华强）**

**◆文化纵横**

什么是好的通识教育**（张亚群）**

**◆卷首语**

**科研人头费不能变成“提成费”**

**熊丙奇**

4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召开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上强调，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而在15日考察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时，李克强询问了科研经费中“人头费”比例，得知该院仅占30%后，总理说，基础科研关键靠智力，发达国家这方面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人头费”占比很高，数学研究甚至达80%-90%。科研“人头费”不要管得太死，否则很难吸引一流人才。

这都指向如何给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曾经面临两难处境：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自主权，担心科研经费被滥用、侵占；而严格限制科研经费的使用，则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还违反科研经费规律，导致更大的经费浪费，比如购买并不需要的设备，以对付上级部门的检查。问题在于，我国高校缺乏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及教师考核评价制度。要给高校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权，把更多经费用到人身上，而不是“物”上，需要改革我国高校的薪酬制度和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确实有很大比例用到“人头”上，但是，这不是用到提高项目负责人的收入待遇上，不是我国科研经费管理中的“提成”，而是用于资助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聘请访问学者上，参与科研项目的高校教师，并不从科研项目中领取薪酬（提成），他们的待遇，通过年薪制保障。就是有教授在大学里拿9个月年薪，也只能在科研项目中领取其余3个月的薪酬，总年薪不能超过约定年薪。这种年薪制，保障了教师的待遇，与此同时，也防止教师靠申请课题“致富”。另外，科研人员所有的科研经费开支，包括每个细目，都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公开，接受监督——不仅科研经费如此，所有办学的财务信息，都全部公开。

而我国高校教师的薪酬制度，却大多不是年薪制，而实行的是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的制度，其中，津贴、奖金，主要来自教师申请的课题，所谓课题经费“提成”，换言之，教师们要靠课题经费养活自己、提高自己的待遇。这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教师申请课题，并不完全出于学术研究兴趣，很多时候是为了生存，学术变得很功利；二是申请到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部分经费就进了申请者的腰包，在国家严控提成比例之后，有的教师就把精力用到怎样折腾经费上。近年来，对于科研经费被挤占、浪费，媒体多有报道，科研人员贪污、侵占科研经费，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

针对科研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科研管理部门，严格科研立项审批，并加强科研经费使用过程管理，但是，这并没有堵住科研经费漏洞，反而约束了科研人员的人手，很多科研人员把精力用到研究如何报销上。这是行政治理思路，只能强化对科研的行政监管。要给科研人员经费自主权，又避免科研经费被滥用、挥霍、挤占，只有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具体来说，要借鉴国外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和学术同行评价的办法，进行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和教师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不改革基本的薪酬制度和评价制度，只是局部借鉴国外大学的某些做法，这些做法很可能发生变异。

从我国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水平看，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已超过GDP的4%,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也达GDP的2%——已经完全有条件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当年靠科研提成来吸引教师、科研人员搞科研的做法已经过时。要让不断增加的科研经费投入，产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需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学术理想，而这必须让学术摆脱行政化与功利化，年薪制与学术同行评价，这就是摆脱行政化与功利化的基本制度，应加快推进改革。这也是我国提出的行政放权改革的重要内容。

原文出处：《北京青年报》2016-04-19

**◆高层要论**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

1993年以来，我们党的总书记每年都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讲话，表明了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今年我的讲话时间作了调整，我先讲，下午王岐山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我完全赞成。下面，我讲4个问题。

**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效**

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中央纪委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遵循党章规定，聚焦中心任务，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夯实管党治党责任。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了旗帜鲜明讲政治、从严从紧抓纪律的氛围。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以严肃问责推动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党员日常管理监督，拧紧管党治党的螺丝。中央纪委通报河南省委查处的新乡市委和市纪委原主要负责人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等一批问题，释放了有责必问、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第二，创新体制机制，扎牢制度笼子。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为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深入研究探索，汲取全党智慧，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我们研究依规治党这一重大课题，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修订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制定党委（党组）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的意见。针对干部管理监督中的薄弱环节，我们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加强“裸官”管理等规定，推动制度建设与时俱进。

第三，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党风民风向善向上。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时，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吃一嘴，囫囵吞枣，最后都没有消化。我们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氛围。我们强调，作风建设一定要咬住“常”、“长”二字，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我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我们抓住重要节点，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坚决防止反弹，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第四，强化党内监督，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我们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擦亮巡视利剑，聚焦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中央巡视组开展8轮巡视，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金融单位党组织的全面扫描。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中，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我们开展专项巡视，冲着具体事、具体人、具体问题而去，推动查处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公开反馈和整改情况，强化不敢、知止的氛围。巡视发现的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在违反政治纪律、破坏政治规矩，违反党章要求、无视组织原则，违反廉洁纪律、寻租腐败严重，“四风”屡禁不绝、顶风违纪多发。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坚持标本兼治，剑指问题，倒逼改革，完善制度。各省区市党委、部分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规范巡视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态势。巡视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凸显了党内监督制度的力量。

大量案例表明，权力越大，越容易出现“灯下黑”。强化党内监督，首先要把中央和国家机关管好。派驻机构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实行单独派驻和综合派驻相结合，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各派驻机构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明显增强。

第五，严惩腐败分子，加强追逃追赃工作。“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我们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同时，我们着力解决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

我们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使我们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想用反腐败问题来拿捏我们，不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场合提出所谓反腐败问题。现在，我们在国际上一举转为战略主动。我们加强反腐败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启动“天网行动”，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将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我们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特别是加大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腐败合作方面的压力，要求他们不要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原来他们认为那些犯罪嫌疑人是他们手中的牌，现在都成了手里的烫山芋。各方面对我们敢于向腐败亮剑是佩服的，我们的反腐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正所谓“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社情民意是观察政治问题的晴雨表。反腐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众给予高度评价。2015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中国社科院一个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9%的企业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中国反腐败表示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这再次印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顺党心、合民意，有着广泛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只要我们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二、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关键在党。“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有的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

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难道还不是政治吗？还用得着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仅恶化政治生态，更会严重损害党心民心。有人说，如果这一次还是出现反弹、出现回潮，那人民就失望了。所以，军令状不是随便立的，我们说到就要做到。

当前，腐败问题依然存在。有的仍心存侥幸，搞迂回战术，卖官帽、批土地、抢项目、收红包，变着花样收钱敛财，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有的欺瞒组织、对抗组织，藏匿赃款赃物，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党纪国法惩处。他们故意制造一些噪音杂音，企图混淆视听，自己好从中脱身。“四风”在面上有所收敛，但并没有绝迹。党的十八大之后查处的领导干部，很多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没有收手，贪图享乐，大吃大喝，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依然我行我素。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出现了各种变异。种种现实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做好今年工作，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尊崇党章，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党章总纲明确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党章第37条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这是对主体责任的具体要求。各级党委要在思想认识、方法措施上跟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把纪律挺在前面，发现问题就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对问题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钟，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开始就咬耳朵、扯袖子，在执纪方面抓得很紧，可以让多少人避免违法？过去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不到违法的程度大家都可以“包容”、“宽容”，到了违法就由他去吧。这是对党和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空军的同志说，培养一名飞行员要花相当于其体重一样重的黄金。我们培养一名省部级干部要多少代价？很多干部从基层做起，慢慢成长起来，最后毁于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出问题的人之前就会有迹象，为什么不及时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把纪律挺在前面。

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了党员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尺。有了执纪监督尺子，就要在贯彻执行上下功夫。各级党委和纪委要首先加强对维护党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情况，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

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问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怜悯之心，要“较真”、“叫板”，发挥震慑效应。前年，我们对湖南衡阳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案件严肃问责，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9人。去年，我们又对南充拉票贿选案进行彻底调查，对全部477名涉案人员严肃处理。这两起案件性质极为恶劣，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挑战。坚决查处这些案件，实施严厉问责，体现了失职必究、执纪必严的鲜明态度。今年，地方领导班子开始换届，要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做好问责工作，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发生了党的领导作用不发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样、管党治党不严不实、选人用人失察、发生严重“四风”和腐败现象、巡视整改不力等问题，就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责任。要完善和规范责任追究工作，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典型问题通报制度，把问责同其他监督方式结合起来，以问责常态化促进履职到位，促进党的纪律执行到位。

第二，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家风问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我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

对那些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年代久远的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惯性问题，要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第三，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只要谁敢搞腐败，就必须付出代价。一棵参天大树，如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会逐渐枯萎。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要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要深入剖析严重违纪违法干部的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教育作用。

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专项行动，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第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易发多发、量大面广。有的搞雁过拔毛，挖空心思虚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金、扶贫资金；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有的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执法不公，甚至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省市两级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抓好县委这个关键，特别是要强化县委书记的责任担当，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第五，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这种风气不纠正、不扭转，对干部队伍杀伤力很大。“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给下级带个好头。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珍惜名节、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传统，历来都讲“为政以德”、“守土有责”，领导干部要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同时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促进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要抓住建章立制，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围绕发生的腐败案例，查找漏洞，吸取教训，着重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制度，压缩消极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有的说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束缚了手脚；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管党治党应“人性化”；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说官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最近，巡视发现，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有的只顾抓权力，不去抓监督，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有的原则性不强，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3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

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决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下面的书记，确保责任落到实处。

第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为之舵，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

加强纪律建设，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提高纪律执行力，维护纪律严肃性。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管住纪律、看住权力，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

第三，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大量事实表明，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险的。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甚至搞非组织活动，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更谈不上查处。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国事无私，政道去邪，法不容情。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决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

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

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组织坦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正确对待权力，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安分守己为党工作；始终牢记政治责任，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第四，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

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三个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工作表现，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四、积极探索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

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当前，党内集中不够和民主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软弱涣散，我行我素、各行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内民主得不到充分保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不能“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第一，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党委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包括对党员的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工作，党委要任命干部，更要监督干部。纪委监督重点是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第一位的是党委监督，不能一谈到监督就只想到纪委或推给纪委。

我们党的执政是全面执政，从立法、执法到司法，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基层，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80%，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95%。因此，监督国家公务员正确用权、廉洁用权是党内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现行党内监督条例，监督主体比较分散，监督责任不够明晰，监督制度操作性和实效性不强。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制度框架确立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问责方面查了一些典型，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推动了“两个责任”落实。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行政监察法要体现党中央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的精神。监察对象要涵盖所有公务员。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明代以后有八府巡按，走到哪里，捧着尚方宝剑，八面威风。我们的巡视不是八府巡按，但必须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根本在于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要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是否维护党章权威、贯彻从严治党方针、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是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督促其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重点检查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着力发现腐败、纪律、作风和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更好发挥震慑遏制治本作用。要以贯彻执行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提高依规依纪巡视能力，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巡视全覆盖本身就是震慑。中央一级巡视对象共有280多个单位，目前还有100多个要巡视，任务十分繁重。下一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全覆盖。要继续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报告反馈、整改落实、队伍建设等工作机制。要创新组织制度，内部挖潜、盘活存量，充实队伍、优化结构。要创新方式方法，使专项巡视更专、更活、更准。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及时跟进，分清问题性质，所有问题都要有明确说法。巡视发现的问题，根本责任在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买单”，不能发现问题后还当“看客”和“说客”。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要开展“回头看”，揪住不放；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

巡视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挖出深层次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堵塞制度漏洞。巡视发现的诸多问题，除历史和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是体制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在管人管事管资产方面，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不力并存，监督手段和监督措施缺位。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切实管细管实，做到有力有效。各省区市党委要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确保在本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省区市党委书记和中央部委部长（主任）、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书记对巡视发现的重点问题，要点出具体人头、提出具体意见，不能点个卯、表个态就完事。

第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生活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特别是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健全。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现象还大量存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缺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勇气，这既害自己又耽误同志，最终伤害的是党的事业。

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这两年，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有了一定提高，但走过场的问题仍很突出。民主生活会要及时开，遇到重要问题或普遍性问题，需要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就要召开民主生活会，把事情说清楚、谈透彻。有了群众反映，接到揭发检举，经过查核确有轻微违规违纪行为，就要让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检讨，大家批评帮助，共同敲响警钟。对巡视反馈的领导干部“四风”问题和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要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剖析批评，提出整改措施。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督促指导，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和水平。

第四，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许多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

严是爱，松是害。各级党组织要多设置一些监督“探头”，使一把手置身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上级对下级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最管用、最有效。上级党组织要多了解下级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对下级一把手问题的反映，多听取下级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的意见。党员、干部可在党的会议上和干部提拔、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环节对一把手实施监督。

上级纪委要把下级一把手纳入监督重点，发现问题线索及时处置。同级纪委要定期将同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落实主体责任、执行民主集中制、廉洁自律等情况向上级纪委报告；平时掌握了对下级一把手的反映，就要及时报告同级党委书记。要健全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制度，对集体讨论事项，每个班子成员必须亮明态度并记录在案。要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做到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谁负责。建立领导干部插手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对违规过问下级有关事项如实登记和问责。

第五，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党章规定了纪委的3项主要任务和5项经常性工作，概括起来，就是监督执纪问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聚焦主责主业，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旗帜鲜明支持纪委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反腐败协调机制建设，把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织协调职能做实。各级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定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开创纪律检查工作新局面。

各级纪委要带头尊崇党章，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遵守党章、执行党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章权威，做党章的坚定执行者和忠实捍卫者。“四个服从”中，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各级纪委要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要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标本兼治，不断取得工作新成效。

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执纪者要做遵守纪律的标杆。各级纪委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保持队伍纯洁，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加强宣传舆论引导。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舆论倾向和氛围。有几种论调还很有些市场，比如，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让干部不作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反腐是权力斗争，反腐应当缓缓手，等等。对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必须加以辨析、引导，驳斥错误言论，化解消极情绪，消除偏见误解，说清楚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从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2016-05-03

**◆本刊特稿**

**全面从严治党 为建设区域性高职名校提供坚强组织纪律和政治保证**

**——在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家健**

**（二○一六年四月六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党风廉政建设大会。刚才，嵇美华、赵聿田两位同志代表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作了交流发言，纪委书记吴海燕同志根据党委意见，简要回顾了2015年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接下来，我代表学校党委，一是传达学习省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长刘希平同志在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二是就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纪委要求和全国、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深入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谈几点意见。

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以来，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传递出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判断、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松懈，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放松。”这是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时的原话。今年的“双代会”，我们确定了学校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建设“区域性高职名校”的目标，需要我们集广大教职工的智慧，举全校师生之力方能实现。近年来，学校在“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服务地方”方针的引领下，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教职工的认可和社会各界的认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学校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校形成了“风气正、人心齐、思路清、工作实”的良好氛围。风气就是党风、政风、校风、教风和学风，“风气正”是我们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保证，是第一位的。可以说，没有好的风气，就不可能有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目前来讲，学校的整体风气是比较好的，这些年事业发展的成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学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部分同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认识还不到位，当触动到既有利益和特权时，总喜欢用老的观念、老的做法来对付新常态和新要求，总觉得是小题大做，说话做事总喜欢与别人比、与过去比；少数同志自我要求不高，作风不实，执行党规党纪和学校决策部署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责任和担当意识不够，部分重点工作和项目的推进力度不够，学校党委提出的八方面改革进展还不平衡；相关职能部门对教学、科研、人才等重点领域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管措施还不完善，对现行制度的执行力不够，审核把关不严，专款没有专用等等。

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和惋惜，但又无法回避且必须深刻吸取教训的是，去年九月初，市纪委纪检监察室入驻学校，前后5个月，对人才、科研、教学等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谈话范围达五十多人次，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保护干部的大局出发，虽然只有个别同志受到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但这个案件的发生无论对当事人和学校的形象，客观上造成了不利影响。从市纪委调查反馈的信息来看，大部分同志能配合调查，如实反映情况，但也有少数同志缺少纪律和规矩意识，总还想遮遮掩掩，不能对组织忠诚老实。反映了我们对干部和教师的教育、管理、监管还不够，个别同志的组织纪律性还不强，需要我们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加强正面教育引导，消除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参加全国人大吉林代表团审议时说：“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加强对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彻底改变对干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进一步全面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就学校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强化教育监督，扎实推进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好学校风清气正的发展局面。

下面，我谈四点意见：

一是要深刻认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要靠全面从严治党作保障。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从严治党、严明纪律的要求。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三年来，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已成为“新常态”，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习总书记将反腐倡廉建设提升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要求全党同志警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所指出的，“现在，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依然艰巨繁重。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和保障自身安全，许多腐败分子互相抱团，形成了腐败利益集团。他们为了壮大势力，以权力、金钱、美色为诱饵，不断拉帮结派，强化其组织性，妄图压制正义、永享特权。对于这样的腐败集团，不仅要伤其十指、断其一指，更要层层瓦解、直捣黄龙，还政治以清明，还权益于人民”。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反腐败反得人人自危、为官不为、影响经济发展；不反腐要亡国，真反腐要亡党等奇谈怪论和错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任凭腐败蔓延确实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真反腐败才能兴党兴国”，“要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坚定不移割除这种毒瘤”。今年1月，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他提出了四个“足够自信”：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同时，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要我们坚持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够赢得这场输不起也不能输的斗争。春节前，从中央到省委、市委都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会议，教育部、教育厅先后召开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中央和省委的新精神新要求，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

就高校来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统计，2015年全国共通报了34所高校的53名领导，平均每周就有一名高校领导被通报，其中11人被“双开”，6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另有8人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6人正接受组织调查。从通报来看，涉及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基建工程、科研经费、招生录取、超标用房用车、大操大办子女婚礼等方面，这充分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正逐步走向深入。

反腐“新常态”告诉我们，从严治党的步伐不会变，力度不会减。习总书记指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在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谁也不能心存侥幸，出了问题，不论是腐败问题还是“四风”方面的问题，也可能被打板子、摘帽子。如果在这些认识上麻木、迟钝、无知，就可能付出沉重代价。201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3.7万起，涉案4.9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4万人。对此，广大干部群众给予了高度支持和拥护。

二是要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三次全会上，分别强调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在即将出刊的新一期《学习与实践》上，我们选编了新华社的“习近平为何反复强调规矩意识”，近期我们还下发了《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希望各总支、各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原原本本认真学习。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和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去年中央修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部党内法规都是从今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学校党委也专门印发了学习贯彻《准则》、《条例》的意见，给每一位党员发放了《准则》、《条例》文本，今年要通过“两学一做”继续深入推进学习贯彻。通过《准则》、《条例》的学习贯彻，让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让守纪的“扣子”扣得更紧，将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党中央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这是从严治党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是管党治党的一次理念创新。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靠的就是严明的纪律。新修订的《条例》明确把党的纪律分为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针对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这些问题集中概括为“七个有之”：“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

对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决不允许”：一是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五是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擅权干政、谋取私利。

对照“七个有之”和“五个决不允许”，学校不同程度是否也有类似情形呢？比如，对上级的要求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或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个别人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组织生活会上不说，总喜欢在其它场合发表与学校党委会议精神相悖的言论。又比如，有的遇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采取明哲保身的“好人主义”；有的总爱耍小聪明，自以为是，咬耳朵不听，扯袖子不动，对学校党委、纪委的反腐败和正风肃纪工作说三道四，妄议妄评；有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局部利益考虑，遇到困难强调客观原因；更有极个别人为了一己私利，与党的组织离心离德，不惜无中生有、造谣诽谤，诋毁学校改革发展，诋毁学校选人用人，不集中精力干事创业，却热衷于匿名诋毁他人；还有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问题，有的同志对出现的问题隐瞒不报，或者报喜不报忧，耽误工作；也有的总把自己当特殊人物，总留恋以前的“特权”，视纪律规矩若无物，选择性请示、选择性报告，不如实向组织报告因私出国境等重大事项。据统计，2015年全国抽查43.9万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问题被取消提拔资格的3900多人，受调离岗位、免职、降职等处理的124人，受党纪政纪处分的160人。凡此种种违纪行为，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请全体党员、干部警醒。

三是要切实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厘清责任、落实责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所在，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学校事业发展稳定大局的客观需要。党委的主体责任是政治责任，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落实主体责任要不折不扣。

党委主体责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学校层面上的第一责任人，班子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相应的责任，如每一位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分管领域的廉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对选人用人环节和日常工作中了解到的干部情况必须如实反映、如实报告；要注重传导压力，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及时提醒、及时解决；要尽责担当，对分管领域发生的违纪违规问题必须亲自过问、亲自督办；要落实责任追究，对分管领域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的干部必须严肃批评、严肃问责等。

在学校二级层面，目前有9个二级党总支和1个直属党支部，全面从严治党能不能落到实处，党风廉政建设能不能扎实推进，二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的落实很关键。各二级党组织书记要成为管党治党的书记，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可以说，只有二级党组织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才能落地生根，学校党委主体责任的履行才能有强有力的工作支撑。各二级党组织书记作为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的思想，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真抓真管，敢抓敢管，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根据习总书记要求，要把主体责任落实到每一个支部。

去年，我们进行了党总支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提高了二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意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大部分二级党组织都能较好地体现主体责任，但各单位之间还不平衡，部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各二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的教育引导，规范科研经费、课程建设经费、人才专项经费的使用，防范经费使用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进一步加强对广大教师的教育引导，严肃课堂纪律，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发表有要求。还有，随着二级管理权限和二级学院绩效分配自主权的扩大，围绕“六大纪律”，尤其在选人用人、资金使用、“三重一大”决策、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凝聚人心以及抓好教学常规等方面，党的基层组织要更好地发挥作用。

学校纪委要切实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责任，强化监督、严格执纪、严肃问责，要理直气壮地监督、执纪、问责，反腐败不用“偷偷摸摸”，要“堂堂正正”。要统筹规划好“监督什么”、“怎么监督”、“如何监督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进监督责任的深入落实。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强学习，以身作则，带头尊崇党章，坚守责任担当，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要适应纪检监察工作新常态和新要求，把握好“四种形态”，发挥好兼职纪检员和监察员的作用，对重点领域和高风险岗位要早提醒、早介入；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坚持严字当头，强化自我监督，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各二级学院、部门要全力支持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开展工作。各重点部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工作，要依法依规接受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根据上级党委、纪委要求，学校党委和行政将为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积极履职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四是要持之以恒，横下心来推进作风建设。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和今年即将启动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作风建设与时俱进，被赋予了一系列新的时代内涵，解决了大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党员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进一步端正。但是，“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防止反弹任务艰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在，有些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好转，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不良作风积习甚深，要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

适应作风建设新常态，首先要重新审视“旧常态”，告别那些见怪不怪的特权、习以为常的“待遇”、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坚决摒弃一切与现行规定不符、与师生期盼相悖的“旧常态”。两年来，我们紧扣“为民、务实、清廉”主题和“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扎实成效；我们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标杆，干部作风为之一新。近两年，学校党委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学校领导班子作风建设的若干意见》、《效能问责实施细则》等文件，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具体推进作风建设，包括规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款旅游问题，调整绩效分配方案，规范津补贴发放，整改了学校领导办公用房，取消了专车接送校领导上下班制度，平时加强重要时间节点和重要事项的廉政监督检查，持续深入纠正“四风”。在每一项工作的推进中，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杂音、不和谐的声音。希望我们的同志能以积极的姿态适应这种权力的笼子越扎越密、群众的监督越来越严、干部的“福利”越来越规范等等的新常态。我们要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始终绷紧作风建设的弦。

适应作风建设新常态，还要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有同志错误地认为，只要不踩“红线”、不闯“雷区”就是好干部，宁可“不作为”也不“乱作为”，宁可“慢作为”也不“快作为”，为官不为，廉政不勤政，群众意见同样会很大。在作风建设新常态下，歪风邪气的诱惑少了，清风正气的环境多了，我们更应该摒弃私利，做到守土有责、责无旁贷，更好地干事创业、推动发展。因此，在作风建设上我们必须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从小事抓起，从身边事抓起，让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持之以恒纠正“四风”。要不断完善师生员工的权益维护机制，畅通诉求渠道，努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动化解矛盾，着力解决师生员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维护师生的利益。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师德风范，营造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我们也要建立作风建设“常态化监督、零容忍问责”的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对工作不力、要求不严、连续出现问题、影响学校全局工作的部门和个人进行问责。

同志们，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当前的新常态体现着民心所向，意味着风清气正，代表着发展大势。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事关学校事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事关建设区域性高职名校目标的实现。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入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只有打好党风廉政建设攻坚战和持久战，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汇聚起学校“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服务地方”的强大正能量，为建成区域性高职名校提供坚强的组织纪律和政治保证！

**◆两学一做**

**论“两学一做”的战略意蕴**

**李拓**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这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抓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决心，体现了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面对繁重的历史任务，全面提升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改革也进入极其艰难的攻坚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生态的整治、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整合与重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民生幸福指数改善等。这些繁重的历史重任对党整体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党的领导对于实现上述历史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央政治局继承和发扬我们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精心谋划组织集体学习30多次，为不断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作出了表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到全体共产党员的全覆盖学习，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整体素质和能力的大事，8700多万名共产党员的素质和能力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推动力。

中央提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对全体共产党员提出的具体学习目标要求。通过“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职责和使命，进一步提升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奋斗目标、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和素质，承担起领导全体人民实现改革攻坚的繁重任务。

针对党员队伍思想状况，强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举措

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在一些党员中出现了不健康、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言论和行为，甚至有些党员公然非议和对抗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这些不良言论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时代具有放大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这些现象，不是简单的党员个人的言论和行为，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技术、资金和理论进入我国后，对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冲击，必须引起足够警惕。苏联共产党在经济改革出现阻力后，由于苏共高层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措施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苏共高层决策者又忽略了对普通党员的思想教育，最终导致改革流产，苏共失去执政地位，苏联解体，教训极其深刻。

当前，在极少数党员中出现打着党员权利的旗号，攻击甚至谩骂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为，如果我们以为这是小事，以为这就是民主和自由，这就是党员的权利，那就为深化改革挖了一个巨大的隐形陷阱。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将进一步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普通党员同党中央保持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是党章规定的铁的纪律，而且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进行反映，这是党章赋予的权利。作为一名党员，要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决不允许不负责任地公开发表反对甚至攻击谩骂党的言论。这也是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意义所在。

面对严峻挑战，坚持“三个自信”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关键环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在又具体的好处。“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垮塌以后，中国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也为世界经济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困境带来了利好消息。

但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生俱来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世界趋势中完全化解，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俨然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眼中的“风车”，于是“威胁论”“唱衰论”甚嚣尘上。随着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这种思潮极具迷惑性。少数党员的思想可能出现波动，我们的道路、制度和理论还有没有价值和吸引力？其实，这种挑战比来自经济结构改革中的挑战更具破坏力。因此，坚持“三个自信”不仅仅是坚持中国道路，更是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维护我们基本的民族尊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就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必然要求。进一步说，这既是对每个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防火墙”、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挑战的必要措施。“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古训不可忘记，“防微杜渐”成语隐含的深意不可不汲取。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师生导师）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6-05-08

**全面把握“两学一做”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曲青山**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化党内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两学一做”的科学内涵，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两学一做”要求，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两学一做”：基础在学**

把学习摆在首要位置，通过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武装头脑、提高认识，是我们党深化党内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鲜明特点和成功经验。中央强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就是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对全体党员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不同要求。这既突出了学习的基础性地位，又明确了学习的基本内容和重点，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要精当适用、区分层次对象、务实管用的要求。

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章程。我们党的党章，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政治主张、奋斗理想和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是管党治党的总遵循，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党规党纪是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党员应当严守的纪律和规矩。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在制定和完善党章党规的同时，对认真学习、自觉执行党章党规作出明确要求，严格用党章党规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言行，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促进了党的健康发展。心有党章党规行不乱。学习党章党规、敬畏党章党规、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强化党章党规意识，是全体党员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迫切需要。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党的90多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我们党艰苦探索的过程，是广大人民群众创新实践的过程，也是党的领袖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发挥聪明才智、耗费心血总结和概括提炼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形势在变化，必须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全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需要明确的是，学党章党规与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二者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和党内的根本大法。十八大党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取得的重大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现了党章的与时俱进，在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发挥了根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一方面以党章和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根本遵循，是对党章和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深入阐释，是对严格遵守党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创造性推动、创造性落实；另一方面又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具时代特点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修订和制定的一系列党内法规，都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充分贯彻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实现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因此，“两学一做”中的“两学”，虽然是学习党章党规、系列重要讲话两个方面的内容，但二者在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央要求把党章党规和系列重要讲话贯通起来学习、统一起来领会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学深悟透，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实际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

二、“两学一做”：关键在做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合格党员，是实干出来的，是踏踏实实做出来的。中央强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关键在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学促做、知行合一，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这不仅明确了学习教育的根本方法和着眼点、落脚点，而且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合格党员的要求和标准，为广大党员指明了行为规范和行动指南，提供了对照检查的“镜子”和衡量检验的“尺子”。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员队伍的建设。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对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和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党的一大制定的党纲和二大制定的党章，都强调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保守秘密，对党忠诚忠实，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1927年6月第五届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第三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必须“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形成比较完整的党员基本条件和标准，并为此后的历部党章所坚持，也是现行党章中关于党员条件和标准的重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强调和重视思想建党，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于思想上建党，强调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思想入党是根本，成为我们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分别提出了党员的条件和标准。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员要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模范的具体要求。1939年，陈云提出了党员的“六条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提出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概括了合格党员应当具备的“五种精神”。认真分析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可以得出两条重要结论：一是合格党员的标准既是原则的、也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都是根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确定的，是同中心任务紧密联系、随着中心任务和时代要求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是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和标准各有不同，但根本性、原则性的东西是始终坚定地坚持、一以贯之的。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指导思想等始终没有变，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始终没有变。正是这些“变”和“始终没有变”的有机结合和统一，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了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适应这一中心任务的需要，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四讲四有”合格党员的要求和标准。这24字的要求和标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状况和面临形势任务的清醒认识，刻画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先锋模范形象的“标准像”，赋予共产党员以新的时代内涵。做合格党员，就要自觉践行“四讲四有”，时时处处事事用这把“尺子”来衡量自己，用这面“镜子”检视自己，提振精气神、展示新作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需要明确的是，“四讲四有”的要求和标准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而是与我们党关于党员的要求和标准一脉相承的，与党章党规关于合格党员的规定是内在一致的，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更具时代特点的新要求是内在一致的，是对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合格党员的规定和要求的集中概括和提炼。为此，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就要同深入领会掌握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合格党员的规定和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学习党章党规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过程中，加深对“四讲四有”的理解领会，加大贯彻执行力度；在践行“四讲四有”过程中，加深对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领悟和把握。

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最根本的是要自觉增强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什么、就认真践行什么，党中央禁止什么、就坚决反对什么，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的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始终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不断胜利前进。

三、“两学一做”：融入日常

中央明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而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央要求，要突出经常性教育的特点，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这就指明了这次学习教育的基本定位和特色。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是有所不同的。集中教育是针对突出问题，针对“关键少数”，大喝一声、猛击一掌，是下“猛药”，治“重病”，集中整治。经常性教育，关键是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在对象上，涵盖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方式上，立足抓常、抓细、抓长，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是细水长流；在目标上，强调“保健”，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把思想政治建设融入日常的党内组织生活之中，推动思想政治建设常态化制度化。

第一，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党支部是党的自身建设和教育管理党员最基本的单位，是战斗堡垒。强调和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支部建在连上”，通过党支部掌握基层，确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关键。从三湾改编开始，支部建在基层，成为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当前，让党的每一个细胞都健康起来，使每一个组织都坚强起来，党支部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央规定，这次学习教育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这充分体现了对党支部地位作用的高度重视，是对党的这一传家宝的恢复和发扬。在学习教育中，党支部和党小组该做什么、如何发挥作用，中央已有明确要求。党支部就要按照党章规定的职责任务和中央要求，找准定位、明确责任，担负起从严教育管理党员的主体责任，切实把任务扛起来，把责任担起来，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个党支部、每一名党员。

第二，要重新拿起和擦亮我们党开展党内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武器，回归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思想建党的原则和要求，我们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育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优良传统作风。但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制度和优良传统作风，有的束之高阁，有的流于形式，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当前，在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漠、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问题，都与党内组织生活不健全、不严肃、不经常有很大关系。在这次学习教育中，中央对“三会一课”、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学习教育过程中，党支部就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重新拿起和擦亮这些武器，回归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通过认真学习领会，明确基本内容，掌握精神实质和方式方法，结合实际严格执行起来、严格开展起来，做到学之深、知之准、行之笃，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发挥应有作用。

第三，要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成效。对这次学习教育，中央明确要求，要强化问题导向，学和做都要针对问题，把解决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为此，党组织和党员要把认真查找和着力解决问题贯穿于日常的组织生活，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围绕中央强调要着力解决的五个方面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列出问题清单，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做到边学边改、即知即改，使学习教育不断取得实效。中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要给基层留出空间。这既是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经常性教育的特点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也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情况千差万别，4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情况千差万别，如何结合实际开展学习教育，如何把抓在日常、严在经常落实到位，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需要不断加强基层党建创新，找到开自己“锁”的那把“钥匙”。当然，这种创新必须坚持和落实行之有效的制度、发扬优良传统作风，在党章框架内进行，切实注重实效，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搞形式化、庸俗化、娱乐化的东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去学，务实去做，就一定会取得学习教育的成效，大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6-05-03

**◆教育视点**

**我们该怎样办大学**

**张尧学**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点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

**办学方式与目标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种模式的交错和并存，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延安模式、美国模式等等。分布格局、学科专业设置、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受苏联模式影响，这种模式有强烈的专业教育意识，同时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作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和刚性管理，强调以计划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调节机制；延安模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政治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学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基本延续了延安模式；改革开放后，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深刻，现在我们谈及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都来源于美国。因而出现了不同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同的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中纵横交错。

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在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一流的“中国的北大”“中国的清华”而不是“中国的哈佛”，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国情、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但是，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种价值期望。正如有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所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培养体系、治理创新都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

在办学理念的实践上，中国大学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我们说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的是考虑到大学的外在形态，包括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等，而未真正去思量世界一流的精神内核。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是世界一流，最根本的是他们培养的人才为其社会和国家贡献了一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然是符合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流”的内核是扎根于国情、扎根于国家的价值体系的。这个思考，我们是缺失的。

其次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上，我们多年来一直高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谓的现代，更多的是以美国模式为标本。但是，我们喜欢支离破碎地、断章取义地去学习和模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科研不行，看看别人的科研怎么搞；课程设置不行，看看别人的课程设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我们必须看到，成熟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系统性的、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的。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它更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如果脱离了这种系统论的思维，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教育的带领下亦步亦趋，模仿或照搬，而不将先进经验与本土国情将结合，此种“国际化”，只会是学得越多，出现的不协调越多。

中国高校目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化为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指挥棒，其本质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导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上至教育部的资源配置评价、下至学校的人事绩效评价，对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基本都是采用国外的工具，从SCIEI到现在的ESI，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大学排名工具，而中国用人评价也将“海外背景”作为选拔高层次人才的首要条件。多年前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学术是“两头在外”——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仪器设备，再花大量的版面费把文章发表在国外期刊，现在还要加上，把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培养的青年人才送到发达国家，美其名曰镀金，实则是学术打工；然后又花费重金和优惠待遇引进这些人才，委以建设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制透露出大学的不自信，在如此扭曲的评价体系下，适应国家时代发展需要、彰显民族精神和民主特色的大学应当扎根于哪里？文化自信和学术话语权如何建立？

**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大学都是服务于其体制的，都必须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承担本国发展的使命，这既是大学教育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大学必须扎根的土壤，也是或隐或显的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职责与使命。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担当，必然需要深入和系统思考，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从小的角度说，事关建设怎样的大学、培育怎样的人才，从大的角度说，事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当前，一些教育界和关心教育的人士，虽然或多或少地感知到高等教育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部分大学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思，或者拿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例如，增加大学语文课程、降低英语比重、推广国学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等等，但是，这些反思和举措大多零碎化，存在“局部观象”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思维，以至于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的、全盘的、系统的思考。也就是说，过多思考达成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技术，忽视对整体高等教育价值观和指挥棒的思考，还未找到统揽全局的“牛鼻子”。

实际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价值观问题的关注日渐增强，将零碎化的思考和布局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时间窗口”已然打开。因而，对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思考，打破仅仅关注大学教育这个“教育尾巴”的末端思维、打破局促于部分领域的工具思维，推进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大讨论、大反思，进而获得教育改革的共性思维，才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获得更具前瞻性、使命性和责任感的、有机衔接的价值体系及其政策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问题与整个教育管理体制紧密相关。时至今日，中国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投入以及大学办学水平，都有了一个质的提高，不少大学和学科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现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估体系和标准，大多缺乏中国本土的标准和话语权，因而，在专业化教育西化和价值观教育中国化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张力。在整体办学条件和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的基础上，我们是时候需要考虑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中国要素了。只有当专业教育、知识教育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趋向高度相关，才能培育我们自己的人才，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流大学。我们有必要反思，是不是国外的发表标准就一定是世界标准？是不是英文文章就一定代表有水平？能够在国外版面发表的论文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评价标准上注入中国要素？吸收西化评价标准的合理之处与中国本土标准相结合，进而推动“不唯西方、兼具特色、服务中国、链接世界”的、自信而不盲从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教育指挥棒，并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培育既接中国地气、又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高等教育的价值观选择起于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经中观层面的制度政策调整传输，最终在微观层面的高校办学单位进行落实。具体到大学，除了基本的育人价值体系相同以外，也不能一套评价标准、一套办学理念包打天下，要根据不同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进行差异化的选择，给予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同时，对于落实国家教育政策的基层高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功能，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在育人理念上与育人过程中形成全员育人、专业育人和立德树人的结合，从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体系到学科设立、专业开设、课程设置、教材体系、科研管理等均须做中国价值和中国标准合一的系统设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标准的绝对排斥，恰恰相反，在此过程需要合理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做到有选择性的吸纳；更重要的是要高度契合并服务于中国价值体系与育人使命，从而做到办学理念“中国之灵”与办学体制“中国之肉”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中南大学校长）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6-05-03

**大学的价值是让学生更有智慧**

**席酉民**

**大学真的在以学生为中心办学吗**

所有大学，几乎没有一个不说自己是以学生为中心、全面育人的。但这个口号已喊了几十年，还在不断重复，其实是因为没做到或者做好！

对于教育和教学，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教育的人都有很多看法，甚至是怨言，而且抱怨已久。就我个人经验，从1977年进大学，然后读研究生、做老师、当院长和校长，直至创建和运行国际大学，可以说三十多年来耳边的这类怨言一直没断过，但也没看到有多么大的改进。为什么老是不变呢？

我曾参加一次非常重要的高校咨询会，感到比较失望。听到的报告、改革方案、分组讨论着实让人失落，因为大家关注的基本上是大学内部管理中的事务性问题，如下一轮的评估或“教育工程”、内部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教授指标的分配、如何追逐各类项目或指标等，很少涉及这个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教育发展的趋势、现代技术和社会对教育的挑战、教育如何应对挑战等。这个现象印证了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曾经指出的，“公共组织的变革很难从自身发起，大都需要其受益者或外部人士去推动其变革”。例如，具有“现代大学之母”美誉的洪堡大学的建立并不是由教授来推动的，而是源自一个外交官的努力。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变革也是由于社会普遍对大学的不满而引发的。

很多人说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体制问题，我不反对。但我想说，不要永远以体制为借口推脱自己不积极行动的责任。在体制演变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管理和技术问题可以解决，无须等待！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一些包括国立大学的校领导，充满了教育的情怀和育人的激情。如果中国高校有1/3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教育体制改革能促使涌现出更多这样的教育领导、管理者和教师，中国社会选人用人制度的眼光也能逐步从证书移向人才的素养和能力，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还是大有希望的。

**以学生为中心，就要帮学生学会学习和成长**

当走进一所学校，无论其说辞如何，会很容易感受到：这个学校到底是以学生为中心，还是所有人的眼光都是围绕着校领导或上面的指标转。例如，目前很多学校更关心一流大学评估，如何凑数字搞一流学科等等，而不是怎样适应新形势帮学生获得最好的成长。

那么学校到底怎样做，才是以学生为中心呢？反思网络化了的生存环境，不难从自己和学生身上发现，学习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从最原始的宗教到知识的传播到研究再到重视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基本上只是大学的功能不断地向外延伸，在运行模式上几乎无革命性的变化。但在知识获取日益便捷廉价的当代，人们很难“无知”。以传授知识解决无知的问题已不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现在人们遇到的问题往往是信息、知识太多，要在杂乱的知识中选择正确的，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或迎接挑战。不懂一件事不怕，“谷哥”“度娘”可以帮你获得相关信息和知识，得到一个大体的答案，难的是你如何判断它的正确性。现在是有知，但不见得懂，不见得会，这才是这个时代学习要解决的最主要任务，相应地，大学课堂也不仅仅是让大家“知道”就行了的。

依此我们来考察现在人们日常的两种学习行为：“Formal Learning”（正式学习）和“Informal Learning”（非正式学习）。

课堂、教学大纲的设计基本上是正式学习。先不说正式学习好不好，认真思考现在的正式学习中，有多少老师认真研究学生为什么要学这门学问？这门课想训练学生什么样的素养？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知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这些东西最合适？怎样保证学习的效果？这些根本问题要么没得到重视，要么没得到有效的研究。

在我所在的大学，我们所做的探索是正式学习已不再是一门课、一本教材、一个老师、一堆知识点。课程由Lecture（讲座），Tutorial（辅导），Seminar（研讨），Project（项目），Workshop（工作坊），Self-study（自学）等组成。讲座一般采用大课形式，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学，辅导是以小课的方式帮学生解读学习中的问题进而深入探索，研讨主要展现该领域最新进展以引领学生进入前沿，项目则帮学生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整合所学知识并训练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作坊等则提供师生更广泛与深入的交流。在这样的正式学习中，最核心的是自学，因为上述所有环节都要求学生在参与之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整个学习过程实现的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和成长。

大学除了需要迅速改进正式学习，还需要对比重日益增加的另一种日常学习行为即非正式学习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如给学生大量的时间自学、研究、参与各种各样的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活动。同时要研究怎样以正式学习引导非正式学习，使其更有价值，以帮助学生在全球化时代和网络环境下学会学习和成长。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体验式学习”，中国民间也有“听一遍不如看一遍，看一遍不如做一遍，做一遍不如讲一遍，讲一遍不如辩一辩”的说法，西方人则讲“Learning By Doing”（干中学）。还有一种学问，叫做“Education Cybernetics”（教育控制论），即教育是学生学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提供环境和资源；老师提供指导；学生学习或相互学习。那么，在该过程中教育者提供什么样的干预，会让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最大的价值？这也是现代教育需要探索的重要任务之一。

大学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但不只是学知识，更是一个帮学生健康成长的地方。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学生应处在核心位置，老师要把自己看成是一种教育资源，看成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而不是塑造者，然后学校提供各种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和平台，支持学生有效学习。在这种情况下，课堂的正式学习只是学习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引导性的，大量的学习发生在课堂之外，以非正式学习的方式，学生通过自学、案例、项目、研究、实习、团队合作甚至是社会的调研等使自己习得知识、训练能力、提升素养。

**让学生更有智慧，是大学价值的真正所在**

网络化环境和信息技术使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在思考它的新版本，大学概莫能外，否则将会面临哈佛管理教授预言的那样将面临破产！那么大学的新版本是什么？

近年来，关于MOOCS、网上教育讨论的比较多，虽然不少网课只是把传统教学计算机化，但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美国的可汗学院。假如一些公司出重资吸引全球最优资源搞网课开发，用现代教育的方式提供服务，便会吸引足够量的学生选读，公司可获高额利润，于是没有一个大学可以跟这门课程较量。如果因高额利润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公司涌现，而大学依旧遵循传统的教育理念单纯地提供知识，大学一定会被打败。但是，如果大学认真研究现代环境下校园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有一千个这样的公司联合起来也没办法打败这样的大学，因为这些公司很难制造出校园的价值。那么校园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没有考虑清楚，就有可能败在这些公司的手下。如果考虑清楚了，你既能利用这些公司站得更高，又可使校园的价值得以提升。毕竟，一个人在屋子里通过网络选学50门课，跟在校园里学50门课的价值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成就，所以选择入校学习，然后去干一番事业。人类从事一项事业可能有几个途径：当外界环境相对确定，利用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就可以实现目标，此时需要学习知识。但当不确定性比较高时，简单运用知识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例如，现在的房地产，是买还是卖。这种决策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价值判断、综合分析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如果再进一步，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和模糊，人们看不透未来。如果再走向极端，面临的环境高度不确定、复杂、模糊和快变，怎么办？此时，只能相机行事，为了生存和应对挑战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能力、素养和智慧。

那么，在能力、素养和智慧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大学教育能够满足时代的要求吗？能力怎样训练？素养怎么提高？如何让学生更有智慧？自然，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育已远远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不难理解，能力靠训练和实践，素养需熏陶和滋养，智慧在感悟和启迪，那么学校如何有意识创造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如何营造氛围和文化、如何设计教学和活动，帮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升他们的能力、素养和智慧？怎样有意识地把这些训练纳入学校的育人计划？这是当代大学需要深入探索的。

为了让学生更有智慧，大学需要倡导研究导向型的学习和教学。

所谓研究导向型的学习，目的是启迪学生的好奇心以释放其学习的动力和潜力，训练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孕育他们的创造性行为，发展他们的一种复杂心态（Complexity Mindset），提升他们的终身学习能力。

研究导向型教学的关键首先是改变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过程。不是应试，而是“解惑”；不是简单教知识，而是领导学生学习。例如，以一门课程知识体系所解释的现象和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尝试通过课内外学习和研究甚或实践去解释现象、回答问题、应对挑战，帮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知识、锻炼能力、提高素养、增加智慧。

其次是老师要改变传统的以知识讲授为目标的教学方法，不再是一门课一本教材一堆知识点，而是根据所授课程的知识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以相关的现象、问题、困惑、人类的挑战甚或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引导学生思考、学习、研究和解决问题，并在整个研究或探索型学习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最后，学校需要构筑资源环境和支撑体系，支持学生和老师的这种学习和教学活动。如果学校能营造这样一种融合网络资源的超现实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帮学生从过去的记忆和理解知识转变成通过研究问题和现象获得知识、能力、素养和智慧，老师从过去的“教书”变成现在的“领导”学生研究型学习，并和学校一道帮助和支持学生通过这样一个探索之旅获得健康成长，校园的价值将是任何网上课程或公司无法比拟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学的关注点从过去的知识转化到现在的问题和现象以及学生的成长，学生收获的将不仅是活的经过整合的知识，而且学会了找知识、整合知识、解决问题，学会了研究、与别人合作，学会了表达和沟通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了他们自己的能力、素养和智慧。这样的教育必然有利于师生形成开放的心态、全球的视野和强大的竞争力，成为世界玩家（Global Player）。当我们师生员工以世界玩家闯荡全球的时候，谁又能质疑我们大学或教育的价值和地位呢！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6-05-03

**“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

**储朝晖**

2015年中国从事在线教育的企业数约2400-2500家，拥有数十万门在线教育课程，用户达到了近亿人次。这些在线教育企业同蘑菇那样速生，也如同烟云那样很快消散，其原因当然有多种，但其共性的原因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教育，采取了外科手术式的“互联网+教育”方式，互联网并没有真正加到教育深层——

3月底，一则在线教师时薪1.8万元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人们在感到互联网的巨大力量的同时，每一个教育当事人都意识到，如何与互联网相处正成为教育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已有的学校、教育机构和管理部门如何应对互联网也成为决定其自身未来状态的转换关键：选择得当就会给自身开辟宽广道路，选择不当就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在“互联网+”的涌动中，教育已成为其中的一个加数，于是有了“互联网+教育”一词的流行。与此同时，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相对于教育的特质和互联网的特征，“教育+互联网”的提法更能准确地反映教育与互联网的关系，更有利于在线教育实践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更有利于深刻、理性、健全地促进教育与互联网结合，更有利于教育当事人或社会成员利用教育和互联网服务来更好成长发展。

**“互联网+教育”靠谱吗？**

“互联网+”的兴起，最初集中在经济学领域，从“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产业”到“互联网+智慧”，实现各行各业所有内容数字化并融会贯通，这一期间它的使用是相对得体的。

后来“互联网+”的说法几乎被不加区分地运用于任何对象，成为万能的词语添加剂，应该说就有问题了。仅教育领域内，除了“互联网+教育”，还有人开始使用“互联网+早期教育”“互联网+职业教育”等等，以及“互联网+课程”“互联网+学校管理”“互联网+教育评价”“互联网+教学”……这些过于随意的表达显然不够严谨，也很难有确定性和确切的内涵，需要依据语言实践的真实需要和汉语的规则加以规范。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使用“互联网+”，一次使用“+互联网”，说明根据实际选择使用哪种组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就以教育而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经历过多次重大的环境、工具的变革，每一次新工具的发明对人类发展都是影响巨大且关键性的，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而教育作为一个行业或专业，它的连续性始终保持着，而且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外在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如同给一株千年古树施肥，依据树的性能、需求和机理去施肥，就能让它枯木逢春，这就是“教育+互联网”理路；以相反的方式，“互联网+教育”，以一张网的方式把这株古树罩住，或用堆土的方式把它掩埋，就可能把它闷死，或是罩住或掩埋了很长时间，两者之间也未发生实质性关系。互联网这一新工具的影响只是比历次更为迅速普及，作为一种工具来说与前几次没有本质的差异。

教育是以人为工作对象和主体的，不同于经济和其他以物为对象的领域，在工业、商业等其他领域或可以用“互联网+”，运用到教育领域时应慎重对待。

**“互联网+教育”“教育+互联网”等值吗？**

有人或许认为依据加法的交换律，两个加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进而得出结论：“互联网+教育”与“教育+互联网”是等值的。但是，由于这里相加的不是两个数，而是两个有社会实际存在的实体体系，位次排列不同导致的效果差距其实很大。

选择“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既基于互联网的特征，也与个人的主观选择相关，其根本性的差别在于主动加还是被动加：选择“互联网+教育”就是把互联网当作操作系统，当成社会以及教育建构的要素和系统力量，依照这种全新基础，依据互联网法则重新统合社会以及教育的运作和管理模式，这种选择实质上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难以体现教育的精髓。经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教育是包含哲学理念、组织实体、方法体系、内容范畴等多层多面多主体的存在，以“互联网+教育”的思路寻求两者的结合，加什么、怎么加依然是一片模糊。

选择“教育+互联网”，就意味着把互联网当作传播工具，延伸现有的教育影响力和价值，原有的社会与教育也需要随着互联网发生巨大的变革，但教育的基本逻辑没有根本性改变，由教育当事人自主选择要慕课还是被慕课，是否选择翻转课堂以及谁在翻转、如何翻转，站定教育立场，明了需要什么，以人的天性为依据而非用互联网去改造人的天性，以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为标准进行选择和结合，方能实现人的健全发展。

如果选择“互联网+教育”，还存在作为操作系统的互联网由谁建造、由谁掌控的问题，最终走向单一标准的最优存在，次优被淘汰，从而导致丧失多样性。“互联网+教育”与“教育+互联网”孰优孰劣，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分析：

首先，从互联网与教育的关系看，无疑教育应该是核心，互联网只是技术和辅助工具；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发展是目的，用于教育的互联网是手段；教育是需求的源头，互联网是更为迅速便捷保障供给的技术条件。若把互联网作为核心，教育只是附庸产品来做，不只曲解了教育，也难以有效满足教育当事人对教育的需求。

其次，从与人的关系看，没有互联网之前，人类就有数千年的教育活动，教育与人已经形成了关系牢固的伴生关系；互联网一产生便与人产生了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相对于教育与人的关系而言，是后生的，用“互联网+教育”就意味着要在后生的、尚不稳固定型的关系上加上先前已经稳固定型的关系，这必然产生关联的虚点和盲点，出现众多的不顺；“教育+互联网”则是在一种稳固关系基础上建立新的未稳固的关系上，紊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需要承认，互联网本身确实会更新人与教育的关系，互联网成为人与教育之间的新媒介，使原来必须要师生在特定时空进行的教学转变为可以较少受到时空限制，有了互联网的教育更加关注互动，互动性的教学体验使教学过程智能化、舒适化。互动的主体依然是人，网络仅是媒介，从逻辑上说是人为了教育的目的而利用互联网，其相加的次序也应该表述为“教育+互联网”。

从方式上看，“教育+互联网”是一种从根上施肥的方式改变教育，而“互联网+教育”则类似于一种从叶上施肥的方式改变教育。后者能改变的是教育的表面，前者则能深层、系统、渐进地改变教育，从两种效果来选择，结果不言而喻。

在实践中，目前多数人一直以“互联网+教育”而非“教育+互联网”的方式对待互联网与教育的关系，由此导致的是一些对教育知之甚少的人把教育与互联网的关系当作单纯的商机，以功利的心态强行侵入教育，或制造“解题神器”之类的工具，或干脆把传统的答案直接搬到网上，客观上对教育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另一些从事教育的人士则以作壁上观的态度对待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或者以违背互联网精神的方式在使用着互联网技术，将过去的“满堂灌”直接变成“满网管”，不顾学生使用互联网往往只是下载考题、复制论文和核对标准答案。

教育不能忽视新工具的发明与运用，同时又不能为工具所牵引而忘了教育自身，如果互联网使用者的教育思想理念没有改变，即便加上了互联网，也未必是教育的良性改变；教育从业者只有从精神上领会了互联网的精髓并依据教育的特性和需求使用互联网，只有当教育的理念更优化，以“教育+互联网”的方式与互联网结合，才能有效避免互联网这个新瓶装落后的教育旧酒。

**“教育+互联网”更有利于人的发展和教育完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起步、应用、融合、创新四个阶段。近些年来互联网硬件建设已基本完成，已进入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和创新阶段，这个阶段重点要推动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教学方法及评价方式创新。

使用哪种组合，语义的差别是一层，但不能仅限于语义的讨论，还要看在实际生活中怎样才有利于人的发展和教育的完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当你面对教育和互联网的时候，怎样选择利用这两者的组合，合理而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先选定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再确定如何利用互联网获得这样的教育，沿着“教育+互联网”的方式使用，更有利于人的成长。

在“互联网+教育”的思维下，出现了大量良莠不齐的互联网教育实体，2015年中国从事在线教育的企业数约为2400至2500家，专门从事在线教育的人员达到8至10万人，拥有数十万门在线教育课程，用户达到了近亿人次。这些在线教育企业如同蘑菇那样速生，也如同烟云那样很快消散，其原因当然有多种，但其中共性的原因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教育，采取了外科手术式的“互联网+教育”方式，互联网并没有真正加到教育深层，多数仅是浅层的包装，而非内生变换的“教育+互联网”方式发展。

稍稍做些调查不难发现，那些不了解教育的以“互联网+教育”方式发展起来的企业总体上存续时间，要明显短于那些以“教育+互联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在线教育实体。只要你的教育做得好，能切实解决用户的问题，加上互联网就能够如虎添翼，不加互联网也能保证生存；如果你的教育做不好，加上互联网也未必就会好到哪里，很可能加速灭亡。就是说“互联网+教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资本和在线教育，走进“教育+互联网”才能良性复归。

沿着“互联网+教育”的思路，很多企业将关注点放在了搭建教育平台上，而忽视了内容的创新与完整性，导致其产品课件和试题重合率极高；忽视了教育需求者的真实需求，一部分教育产品只是在用“炫酷”的技术做表面的“先锋实验”，并没有针对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提出相应的对策，严重脱离了教学实际；或对线下教育进行简单复制，以为把它们放上互联网就必然优于没有互联网的教育；或过于简单地认为互联网必然倒逼教育变革，必然带来更公平、均衡的教育，有移动终端就可在任何地点在网上选择各自喜欢的课程学习。

从“互联网+教育”转向“教育+互联网”,要从转变教育理念、态度开始，让教育积极主动地去加上互联网。

从历史发展看，教育总体上是每个时代相对保守、封闭的社会构成，而互联网却是当下社会技术和理念传播的前沿，是开放的。一些人担心，“教育+互联网”是否会在实践中拖整个社会前行的后腿，甚至认为，“教育+互联网”是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嫁接互联网，教育行业传统思维占据主导，无论技术、人才，还是运营管理等都与互联网特质相去甚远，产业升级速度缓慢。“互联网+教育”才能使互联网思维占主导，颠覆以往的教学主体、教育模式和运营思路，并对传统教育体制产生倒逼作用。

实际上，这种希望通过互联网对教育做“颠覆”的认知，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岂不知唯有将这部分力量激活，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力量，变革才是理性和良性的。

以“教育+互联网”的方式推进实践，强调的是教育内部变化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有了互联网技术就意味着先进，需要切实以学生发展为本，依据互联网技术所能提供的新的可能性，遵从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灵活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主动地在教育哲学、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学习方式、评价技术、教育管理、教师教育、教育环境、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校组织等多方面谋求变革，而非被动地成为互联网的拖曳或补丁，从而实现对整个教育生态的重构。

在具体的教学中，“教育+互联网”不是要沿袭教育的保守和封闭，而是要教育当事人积极主动迎接变化，就是要尊重每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参与到开放、互联、互动的多元建构中，利用信息技术支持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差异化学习，实现每位学生的个性化健全发展；注重互联网产品的实际教育应用效果是否有利于教育品质的提升。

**“教育+互联网”的管理应对**

互联网用于教育亟须教育的管理变革，这种变革的关键在于行动要依据互联网特性、符合互联网精神。

从不同角度看互联网可以得出互联网特性的不同表述。从管理角度看，平等、开放、互动、共享是其主要特征，而传统的形式化或制度化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都相对比较封闭，难以共享，互动性不够，也存在等级性。这种等级性不只存在于师生之间，还存在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师生之间相互选择，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相互选择。其结果是不当的教学会使学习者远离而被淘汰；不当的管理者会使被管理者逃离而被淘汰，因此教学、管理乃至评价更接近于多方协商而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认可的规则，并遵循共同认可的规则。

从符合互联网精神的角度看，服务是互联网的基本精神，从管理角度看，实现由管控到服务是“教育+互联网”在管理上的本质性转变。

有鉴于此，“教育+互联网”需要整体更新管理理念，让各方以开放的心态，平等参与规则制定，共同维护互联网教育良好秩序。同时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避免非专业话语对专业话语的“绑架”。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6-04-19

**◆内涵攻坚**

**经济社会转型期应彰显尊重“工匠精神”**

**——《大国工匠》纪录片对职业教育问题的深度折射**

**聂伟**

2016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社会的热烈讨论。联系去年“五一”期间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以及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八集系列纪录片《大国工匠》，可以看出国家高层正在着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社会氛围，同时也折射出不少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1：专门技能者未被视为“人才”**

世纪之交，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跌入低谷。此后，国家便把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外部保障。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氛围。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逐步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更是提出，要引导全社会确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创新的观念，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去年的五一劳动节表彰、《大国工匠》的播出以及现在“工匠精神”的提出等，营造了有利于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尽管官方在文件中明确提出，“人才”包括专门技能者，但在实际人们的话语体系和社会文化习惯中，“人才”还是“高大上”的称谓，主要指拥有“专门知识”的高学历者或科技研发人员。这受劳力者与劳心者分层的影响，是传统社会阶层论的论调。从理论上讲，人才应该分布于各个行业，各行各业都应该有自己的人才，而不应该按照从事的行业和工作界定某一群体是或不是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即是说每一行都会有自己的高精尖人才。

电焊工作为一个行业群体，高凤林做的是给火箭焊接发动机，35年为130多枚火箭焊接了发动机，占到我国发射的长征系列火箭一半以上。张冬伟能在LNG（Liquefied 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气）船上“缝”钢板，游刃有余，这种船在零下163℃极低温环境下运送液化天然气，对焊接技术要求特别高，建造难度堪比航母。显而易见，他们都是焊接行业的人才。

**问题2：技术技能未被纳入创新体系**

我们对创新存在两方面的窄化和狭隘理解，一是认为只有创造新东西才能叫做创新；二是认为创新是科学研究的事情，不包括技术技能创新。

其实，科学和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方面，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产物；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手段和方法，不存在孰轻孰重，更不能厚此薄彼。当前存在的轻视技术与工艺的观念，是造成我国工业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创新是科学研究创新的延伸和深化，是科学研究创新的落地和转化，只有完成这一步，才能真正推动生产的革新、产业的升级和社会的进步。

作为高铁首席研磨师，宁允展可以在0.05毫米的空间里研磨工件，全国只有他一人可以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操作，而且获得过五项国家级技术专利。这种来自于一线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技能创新，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技术进步，理应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得到等值的认可和尊重。

**问题3：职业院校难以培育出合格人才**

当前，职业院校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但由于缺乏真实的工作场景，无法培育出合格人才，才有了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为学生营造技术技能训练的环境和成长土壤。

录片中八位工匠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几乎都是由师傅在工作现场手把手带出来的，同时他们也大多沿着师傅的脚步带着自己的徒弟，使技艺传承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手工技艺传承更多的是缄默知识，主要靠学习者跟随师傅耳濡目染，靠观察揣摩，体会并内化技术操作的要领和精义。

宣纸工艺高级技师周东红带着徒弟一起捞纸，言传身教，只有长时间站在槽沿边上，才能找到平衡感，保证纸张的厚薄一致，才能使徒弟掌握精湛的技艺。港珠澳大桥隧道工程首席钳工管延安在师傅的带领下，经过艰苦训练和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凭着手的感觉就可以判断一毫米的间隙，成功在海底对接了16节每节重达八万吨（长180米、宽38米、高11.4米）的沉管，实现零失误，本领不但超过了师傅，自己还带起了大学生徒弟。

**问题4：工人待遇低影响职教吸引力**

技术技能工人待遇问题是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制约职业院校学生职业发展的源头性因素。

纪录片中八位工匠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但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状态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飞机首席钳工胡双钱在我国航空制造业工作了大半辈子，两年前才从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搬出，贷款在上海宝山区买了70平方米的新家。宁允展没有高档的实验设备和实验室，有的只是在自家略显破落的30多平方米的小院里，自费购置设备搭建的一个简易工棚，供自己练习手艺，钻研技术难题。可见，技术技能人才在经济收入、福利待遇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明显低于其他劳动者群体。

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去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表示，要提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一线技能工人的收入，让蓝领工人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今年“两会”期间，已经明确提出要健全高技能人才薪酬体系，提高技能人才工资水平。

**问题5：工匠精神没有渗透进教育教学**

八位工匠身上集中体现了工匠精神的意蕴，处处闪耀着工匠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应该得到传承、继承和发扬。

而在当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主体的职业院校中，为了凸显职业教育的特征，证明其存在价值，过度强调学生技术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学生的职业道德熏陶和职业素养养成。为此，有必要将工匠精神渗透到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中，使学生成为具有完满人格的职业人。工匠精神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爱岗敬业，热爱所从事的职业。认可自己的工作岗位，才能付诸热情和全身心投入。纪录片播出的八位工匠对工作岗位都充满了深深的爱，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工作了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有很强的职业荣誉感，这是从事一项工作、做出成绩的基本前提。

二要能吃苦耐劳，耐得住寂寞。周东红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要站在槽沿边，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每天都要重复一千多次的捞纸动作，一年要捞三十多万张。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怨言，反而认为如果从事了别的行业，可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传承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到自豪。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席钳工顾秋亮为了提高潜水器组装的精度和密封性，长期直接用手抚摸潜水器和玻璃罩界面，不戴手套拧螺丝，手指的指纹都磨平了，导致考勤刷指纹都无法完成。管延安的工作环境在海下十几米，黑暗潮湿，阳光氧气都不充足，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无论多么艰苦，都任劳任怨，忍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让人敬佩。

三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和完美。孟剑锋为给APEC期间来华的国际领导人打造国礼，亲手制作了30多把錾子，最小的一把在放大镜下做了五天，小簪子底部的面很小，却要造出20多道细纹，每个细纹只有0.07毫米。制作一个果盘，要在只有0.6毫米厚的银片上进行百万次的錾刻敲击，一次失误就前功尽弃。胡双钱参与的“C919大飞机”制造项目，有些小零件比曲别针还小，上面还要打孔，允许的误差仅为十分之一毫米级，他都靠手工完成，一丝不苟。

四要甘于奉献，具有崇高的职业使命感。胡双钱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航空制造业，经历了企业的衰落和困苦，经受了其他企业的高薪诱惑，仍矢志不渝，坚持到现在。支持顾秋亮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潜水器关系到潜水员的生命，必须要细致入微，不能有半点差池。管延安去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他认为参与国家工程是他抛家舍业的初衷，是忍受寂寞的精神支撑，也是铭记终身的荣誉。纪录片播出的八位工匠大多面临过外界的挖墙脚，却都拒绝了，质朴的语言表达展示了让人感动的职业使命感，正是对岗位的执著和坚守铸就了他们今日的辉煌。

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专门列出，将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一类人才进行培养，用来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并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技术技能工人作为一类人才会得到应有的认可，其劳动价值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从而真正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2016-04-19

**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未来**

**尹绪忠**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职教育内涵发展越来越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建设规划》）；2015年，教育部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创新计划》）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管理计划》），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颁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高职教育驶入内涵发展的轨道。内涵发展是相对外延发展而言的。外延主要看投入、规模、速度、人数、学校、就业率等数量指标，内涵则注重结构、效率、效益、成长性、满意度、教学水平、社会评价等质量指标。从外延发展到内涵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和历史过程，包括理念的变革、思路的转向、方式的转型和层次的升级等多个方面。要使高职教育内涵发展，必须解放思想，面向未来，虚实结合、以虚促实，总结经验教训，廓清认识误区，树立并落实正确的教育观、发展观和政绩观。

**理论是源，决策是流**

理论和决策谁先谁后，反映的是一种理念。高职教育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其概念在上世纪末才成形，虽然起步晚，但是进展快。一些高职院校领导，特别是新办院校，凭经验想当然，忽视理论，满腔热血，急于求成，仓促上马，贪大求全，往往事与愿违，发展难以为继。理顺理论和决策的关系，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当务之急。

理论是拿来尊重的。理论与决策的关系，本质上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本来不是个问题。理论来自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推动社会实践进程波浪式向前，人类认识社会螺旋式上升，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整个高职教育也好，实现高职教育内涵发展也罢，须臾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

理论指导，研究为上。第一，分析、判断当前形势。换句话说，就是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我国高职教育不到20年，学校数量远超本科院校，在校生规模占据半壁江山，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职业教育现代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内涵发展是指导思想的转轨，从讲数量到讲质量，由比规模到比效益，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和高职井喷式增长的纠偏要求使然。如何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探讨新思路？答案就是，只有正确的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

第二，认识、把握高等教育规律，亦即了解高教潮流和大势所趋。规律教人敬畏。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必然的联系，不以时间、地点和人的因素为转移。高职教育是有自身规律的，要有办学宗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配备、师资结构、社会服务、教学评估、校企合作，等等。除了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外，高职教育也有职业教育的特殊规律，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融合。高职教育姓“高”、名“职”，是跨界的。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第三，回应、担负人民的重托，即顺应民心所向，赢得社会承认。高职学生是高考录取的最后批次，“兜底”教育是高职的职责。大众化、个性化和自然人、社会人是两对矛盾，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就是要把大众化和个性化有机融合，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名牌大学是“高进高出”，高职教育是“低进高出”。“低进高出”责任重，需要更大的投入（情感）、更多的支持（道义）和更艰辛的付出。形势、规律、民意，如立体坐标的三大维度，决定高职教育的定位，是每所高职院校决策时必须遵循的依据。

当然，理论研究不是理论指导的全部，理论指导决策、推动发展，除了研究，还要加强理论学习，读些经典原著，精而管用，做到用理论知识武装头脑，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方法灵活，让读懂经典成风气，运用理论成习惯。高职教育内涵建设路途中，理直，气才壮；源远，流才长。理论的源头源源不断，决策和发展才会奔流不息。

**专业健身，文化铸魂**

满足地方（行业）紧缺性高素质技术人才需求，是高职教育服务社会的使命。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由需求方（企业、行业）和供给方（学校）一起决定。专业教育和素质提升是高职教育的过程，互相促进，不可替代。

《高等教育法》指出，高等教育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遗憾的是，许多高职院校断章取义，我行我素，把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对立起来，一味强调高职学生的专业技能教育，将高职教育等同于“短、平、快”的职业岗位培训“速成”或与高中同级的中职教育。

毋庸置疑，高职教育要培养专业技能，是教育的工具理性，专业教育是高职学生大学生涯的主要课程。另一面，高职教育属于专科学历高等教育，得履行“成人”功能，是教育的价值理性。《决定》和《建设规划》强调，高职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应该有梦想，遵循取之有道的致富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有技术，且有能够带来稳定收入和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动手能力；有文化，懂得基本的社会生活常识和遵纪守法、明辨是非的思想觉悟；有担当，养成助人为乐、甘于奉献、心忧天下、责无旁贷的主人翁情怀。大学育人的文化丰富多彩，思政课、公共课、选修课、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校园环境、学生工作等，“条条大路通罗马”。仅有专业“躯体”，道德精神不足，无异于行尸走肉。高职教育，解决就业，只是最低要求。

国家要求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首先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单是身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根本的是思想意识、行为习惯和人际关系的变化。高职学生年龄处于青春期“晚期”，绝大多数上高职的农村孩子，读完大学就可能走进城市，从“农村娃”变成“城里人”（至少是常住）；独立生活，由“小农”变成自给自足的“大人”。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过程中，高职教育岂能不三思而后行？

教育在乎过程。高职学生大学期间，身心逐步成熟的同时，要化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注重个体的内在品德，包括职业态度、职业追求、职业伦理、职业规矩、职业情感、职业习惯和职业团队意识等，靠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赚点钱成暴发户容易，富贵不能淫成贵族很难。专业技能训练想快可快，铸锻高尚灵魂却非一日之功。

专业是硬功夫，文化是硬骨头。无论是人的城镇化，还是培养制造强国的工匠，专业和文化都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视文化育人并非否定专业教育的意义，谁都知道，没有专业技能“垫底”，文化是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

**教学立校，管理强校**

教学和管理是高职院校的两个轮子，相对独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教学是高职院校的主业和生命。所有院校无不重视抓教学工作，教师是学校的主人，教务部门是职能部门的轴心，其他部门似乎都是教学的辅助机构，因此，一些院校陷入重教学、轻管理，强教学、弱管理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成了“一边倒”的瘸子。

管理，管人理事，管人在先。西方寓言有云：3只鹦鹉，第一只毛色鲜艳，满一岁，会一种语言，售价200元；第二只体格健硕，满两岁，售价400元，因为会两种语言；第三只年岁已老，色相平平，售价800元，众人不解。问主人，原来第三只是管前两只的，是前面两只的“头儿”。寓言虽然浅显，但是道理深刻，专业人员可贵，管理价值更高。《行动计划》要求，高职院校创新发展必须坚持教学改革与提升治理能力相结合，推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依法制定章程，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研究表明，大学管理分经验治校、制度激励和无为而治等3种类型，属于3个层面，或叫3个阶段，层层递进，依次升格。最低层次是经验治校，主要是人治，靠学校“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制度激励是第二层次，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有章必依，违章必究，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法权地位，激发教师的尊严感、学生的自豪感和全体员工的成就感，用制度打开所有人的事业空间，为所有人提供追求梦想的保障。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绝大多数是经验管理，处于第一阶段后期，存在三大短板。一是学生管理工作跟不上时代要求。当今世界，物质丰富，衣食无忧，信息泛滥，通讯发达，文化多元，张扬个性，喧嚣浮躁，急功近利，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学习环境、生活条件简直是今非昔比、天上地下，而学生工作部门的职责和辅导员的工作方式基本没有变。二是现代高职教育制度体系严重滞后，许多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和配套性。由于建校历史短，有的还来不及建章立制，即使制度“等身”，有的也是应付检查，急急忙忙且零零碎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三是高水平管理队伍尚未形成，真正懂高职的管理大家和懂管理的高职行家不多。新中国的高职教育白手起家，一些高职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干部是半路出家。虽说“草鞋没样，边打边象”，不断加大投入，培养引进结合，高职教育管理人才团队仍然捉襟见肘，有的只好赶鸭子上架。

教师好像前台的演员，行政人员是舞台后面看不到的人。在学校这个大剧场，灯光都打在教师身上，表演的真正成功离不开那些写剧本的、灯光、舞台设计等负责幕后的人，他们的作用更大。日本一位大学校长如此说。一所优质的高职院校，其教学领域的“精彩演出”是相似的，品牌课程、特色专业，可看可听，你有我有大家有；“幕后”的管理服务则不一样，如土壤、空气、阳光，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且人人有份。《管理计划》刚刚开了个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考核、分工、统筹、聘任、饭堂……像个小社会，管得好的话，政令畅通，心齐气顺，共建共享，事业兴旺，曲终人不散，人走茶不凉，品牌成名牌招牌，特色成优势强势。

**科研驱动，服务至上**

《指导意见》对高职教育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如“加快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与当地创新要素资源对接，与经济开发区、产业聚集区创新发展对接，与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需求对接，建成有区域影响力的先进技术转移中心、科技服务中心和技术创新基地”的总目标，同样适用于综合类高职院校。怎样“融入”，如何“对接”，主要是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教学过程“产教一体”，要求高职院校具备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务实热情的服务态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双师”队伍建设“练内功”。

为什么科研是能力呢？是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高职是专科，老师教好书足矣，不需要也搞不好科研。科研是长期学习思考的智慧，是日常工作养成的习惯，是思维方式训练的沉淀，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的“薄发”，不仅不会影响教书育人，而且会为上课和实训夯实基础、创造空间、开拓视野。“985”和“211”院校的科研积极关注宏伟的国家战略，而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要尽量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一是课程开发，消化国家统发的课堂教学和实训实习教材；二是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给企事业单位及时提供帮助；三是承担课题和成果转化，让项目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研是发动机，驱使懒惰者勤奋，引领守常者思变，逼迫攻关者结盟。在高职院校，不重视科研或没有科研能力的“教书匠”是没有后劲的。

为什么服务是态度呢？因为高职算大学，教师不愿意走出校园，不乐意接受上课之外的安排；行政人员有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层级分明，按部就班。学校是个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对学生、对同事、对社会的服务，态度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懒散的，是主动的而不是消极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影响服务态度的原因无外乎两个：知识分子清高的秉性和市场原则的潜移默化。提高服务意识，首先要调整学校教职员工的思想观念，强化服务员的角色认同，摆正个人与学校的关系，无论社会怎么变，学校是服务部门、教育是服务产业的性质不会改变。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对教育者也要加强职业教育，学高为师，行高为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能斤斤计较、按酬付劳，甚至少劳多得、占小便宜。

有“为”才能有“位”。教师是“为”的主体，教师“有为”，学校和教育才能“有位”。科研能力和服务态度，是师资（广义）团队核心竞争力的一体两翼。科研能力是生产力，服务态度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前者无后者，会掉进“拉美陷阱”。科研能力是经济基础，服务态度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后者无前者，讲服务会陷入“空想”。科研能力是硬实力，服务态度是软实力，内涵建设必须硬软兼顾，协同共进。既要有想法，也要有办法。在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产学结合时，学校科研能力通过给学生和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体现出来，教工良好的服务态度反过来为优秀的科研能力添彩。

我国高职教育的又一个春天来了。不自信无以立根本，不批判无以识天下，不创新无以图未来。理论建设是高职转轨的逻辑起点，理论是实践的结晶、历史的积淀、行动的指南，理论建设是理论自信的先决条件，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的基本前提。发现问题不是否定现实和否定成绩，而是为了把党的教育方针落到细节和实处，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实现绿色发展。从大学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开门办学，开放发展，全面服务，紧跟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增强高职院校的贡献率、知名度、美誉度，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真正未来。

（作者系广东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2016-05-05

**撬动现代学徒制的支点是“利益”**

**王喜雪**

当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职业教育形式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之时，当职业教育人绞尽脑汁地寻求发展之时，现代学徒制走进了人们视野。现代学徒制综合了学历职业教育和在职职业培训的优点，使接受现代学徒制的人员既符合行业企业对职员的要求，又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可以说是职业教育中最理想的一种教育形式。

在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并面临诸多问题。

**现代学徒制强调企业本位**

现代学徒制是与传统学徒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建立在传统学徒制基础之上的。现代学徒制传承了传统学徒制的一个核心特征，即：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式；同时，又加入了现代学校教育的特点。

现代学徒制是企业和学校双重参与的职业教育形式，那么，企业和学校在其中的地位是否等同？笔者认为，现代学徒制是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制度，也就是说，在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中，如果离开企业的积极主动参与，那么也就不成其为现代学徒制度了。

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讲，现代学徒制度的构建需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促进企业和学校参与的制度设计；其次是企业和学校的责任制度设计；再其次是企业、学校和学徒的利益保障制度设计。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基础，如果基础没有打好，则无法谈到其他的环节。

**现代学徒制是深层次的校企合作**

现代学徒制不同于传统学徒制，首先是教学主体上的区别。传统学徒制的学习是在工作地点完成的，并没有牵扯到其他组织；而现代学徒制中加入了学校教育因素，学徒既要在企业接受相关教育，又要在学校接受相关教育，这也是根本区别于传统学徒制的地方。因此，学校的参与成为现代学徒制的重要特征。

其次，是传授知识的区别。传统学徒制主要是以传授操作技能为主，解决的是一项具体的工作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是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授，“言传是很弱的，甚至是无法言传的，模仿是其基本形式，在模仿中逐渐熟练，在熟练中逐渐悟到含糊的经验。学到精细处，只能是产生出自己的经验。传统学徒制所传授的技能知识具有明显的隐性知识的特点。”现代学徒制则是在传授隐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显性知识的传授，显性知识是脱离于工作场景而存在的一般原理性知识，有些甚至是对既有隐性知识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之后上升成为原理性知识。可以说，现代学徒制是结合了传统学徒制和学校教育的双重优点。

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它和现代学徒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主体来讲，校企合作和现代学徒制均为双主体，但是校企合作的双主体并未明确是谁处于主导地位，而现代学徒制则一定是企业主体为根本的。从内容来讲，校企合作的内容范围大于现代学徒制，参观、实习、人员交流、教材开发等均是校企合作的内容；而现代学徒制的内容是明确的，主要是学徒的技能学习和基础学习。从合作范围来讲，校企合作中双方合作项目较多，但合作深度则不一定；现代学徒制中双方合作项目明确，具备合作深度。

可以说，现代学徒制是校企合作的一种实践模式，归属于校企合作的大范畴之内，属于双方深层次的合作。

**明明企业本位，为何教育主推**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职业院校积极主动，企业参与不足，由此出现了悖论，现代学徒制本应是企业本位的职业教育制度，但是现在成为教育部门主动推进的制度建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从利益的视角对企业进行制度需求分析。

对制度的需求主要起源于这样的认识：一个新的制度能够为参与者带来原来得不到的利益。纵观国外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企业主动参与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为行业企业培养技术型人才；第二，参与现代学徒制可以为企业树立在行业内的形象；第三，国家对于现代学徒制的企业参与者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补助。这三个方面的利益所在成为企业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的主要动力。

在我国实践中，现代学徒制发展的主要阻力在于企业动力不足。企业和职业学校的合作主要体现为以下特征：一是主要集中于需要大量工作人员的行业，比如服务业和制造业；二是主要集中于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培训。这一现象说明，就目前来看，企业参与的动力主要在于用人需求，而第二和第三个动力不足。我国行业发展始终处于政府监控之下，行业自律行为严重缺乏，因此，第二个主要动力不足。国家目前对于现代学徒制的推进政策缺位，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因此，第三个主要动力不足。

**满足企业利益需求才是根本**

依据国际经验，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我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现代学徒制的形成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并强化企业参与意识，完善学校参与制度。第二，由于牵扯到企业和学校两个部门，单纯依靠教育部门进行制度规范不可行，必须是由政府主持的整体设计，才能够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现代学徒制的建设，需要几个方面的制度构建为依托。首先，应建立财政支持制度。包括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政策等。其次，应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职业资格制度是衡量人才培养标准的重要依据。再其次，建立项目监督评价制度。政府以制度形式规范项目发展秩序，但是监督主体要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担任。

行业在现代学徒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鉴于我国的行业协会发展的特殊情况（往往是政府主办），如何促进行业协会的发展活力，使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成为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的改革决心有目共睹，政府职能转移成为行业协会发展的有利契机。成熟独立且受到社会认可的行业协会是引领企业积极有效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关键因素，其职能主要包括技术人才标准制定、企业参与监督与规范等。

作为现代学徒制的重要参与者，职业学校要明确自己在现代学徒制中的职能和责任。学校与企业对学徒的培养分工不同，企业是对现有技能技术的实际操作训练，而学校是对学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培养。对于学徒来讲，如果还是采取老一套的讲授和灌输的方法、还是原来的教学内容，必然不会受到欢迎。对于已经饱受诟病的职业学校来说，真的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将来的方向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2016-04-26

**高职院校如何“精准”优化专业设置**

**——关于中国特色“双三元”职教模式的思考与探索**

**刘华强**

专业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职院校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是体现学校办学内涵、办学特色、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标志，也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软硬件设施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的基本依据。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影响学校招生、学生就业、学校能否较好地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关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高职院校由职工大学、高等专科学校、成人教育学院和部分重点中专，通过改革办学模式、调整培养目标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随着学校办学自治权的扩大以及高职院校设立的主体、背景、时间的不同，在高职院校大力推进内涵建设、办学体制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的新背景下，一些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依然还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问题1：缺乏与政府的沟通协调，专业设置没有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主观盲目开设新专业

在我国教育体制中，政府既是教育投资者，也是教育主办者与管理者，其对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规划直接引导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方向，而与其相关的促进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职业教育的资金和为职业教育搭建的平台等也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专业培养人才质量的高低。当前，一些高职院校在未对政府整体规划进行研究分析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为抢夺生源，就盲目主观地开设热门专业，短期行为、市场化倾向比较明显，教学质量低劣，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误人子弟的现象，不仅严重浪费了教育教学资源，而且不利于提高专业的质量水平和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问题2：缺少行业企业的指导与参与，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和企业需求对接度不高。

近年来，一些高职院校在培养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所需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方面效果并不明显，突出表现为“两难”：企业招聘合适的人才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其背后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学校在设置专业时，缺少行业企业的指导与参与，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方法等仍然保留着传统模式，与产业结构和企业需求对接度不高。如某机械加工岗位的操作，应该是综合了材料、力学、加工基础、识图、工艺规范等综合知识和技能的运用，一些高职院校采取将相关知识分门别类，按材料学、金属工艺学、机械基础、制图识图等课程分别开展教学，培养对象被运用传统的强化逻辑思维能力的教育模式来培养的现象居多。表面上看，这些专业内容与行业企业岗位工作内容还是对接的，但深层次思考则可意识到，真正的岗位工作不应只是某些知识和技能的累加，而应该是针对这些任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

问题3：缺乏优质教学资源支撑，专业设置管理体制与普通高校体制“趋同”，所设专业“一边倒”雷同现象严重。

目前，一些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沿袭普通高校的体制，专业设置也大都雷同，选择开设商务外语、文秘、会计、电子商务等成本低、易于教学、见效快的专业，而不顾及自身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方面教学资源的积累与提升，导致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专业越办越窄，甚至成为“昙花”专业，影响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其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设置专业要取决于社会需要，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上述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势必造成各类高职院校有限的教育资源过于分散，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不过确实，这项任务光靠高职院校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借力“政、企、行”多方合作，才能共同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实现多方共赢。

基于此，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在深入研究并重新审视德国“双元制”职教体系的前提下，在总结中国高职教育十几年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设置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构建由“政校企”（即以政府为主导，以学院为主体，以企业为支撑）办学模式和“行校企”（即以行业为指导、以学院为主体、以企业为支撑）人才模式组成的“双三元”职教模式，满足区域发展“用专业”（专业发展整体规划、专业设置与产业对接），“用人才”（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学生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以及“用有效的合作”（多方合作协同育人结构和层次以及实施路径）等需求。

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中，学校、政府、行业、企业这四个要素各司其责，既有自身在产业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又各自承担培养人才的重任。其中，“政校企”是前提和基础，解决政府政策引导不力，校企合作法律缺失等问题，为高职院校协调产业发展设置专业从宏观层面上提供政策支持与保证，解决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行校企”是关键和抓手，从中微观层面解决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热情不高等问题，促进学校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提升，解决职业教育如何培养企业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问题。“行校企”三元中的行业是指导，解决中观层面上指导专业办学定位问题；企业是支撑，解决微观层面上职业标准与课程标准对接问题。“政校企”提供政策、打造平台，“行校企”负责实施和执行，同时又把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反馈到“政校企”层面，“政校企”对其进行指导和帮助。二者相互促进支撑，达到培养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促进高职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的目的。

为此，我们学院主动适应珠海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多措并举推进“双三元”职教模式的实施，优化专业设置，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和社会经济为高职院校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配合政府对当地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规划优化设置专业。

由珠海市政府牵头，建立了职教联席会，珠海市人大立法，出台了《珠海市职业教育促进条例》，共同为高职院校的发展和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制定政策法规、落实合作项目、扩大基金支持，形成制度化的战略合作，建立“双三元”人才培养共育共管的保障机制。为此，学院专业设置围绕珠海“三高一特”产业布局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成立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航空与海洋装备学院、人文与社会管理创新学院；新开设船机、港口与航运、航空服务、会展旅游服务等专业；对接相关领域和产业企业，分别建立珠海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珠海智能电网应用技术、珠海机电设备与工艺、华南地区港口煤炭集疏运等4个协同创新中心，为珠海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挥重要的支点作用。

二是高度重视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升级的研究，专业建设密切联系产业企业发展需要，形成专业链、产业链、创新链三链有效互动对接。

珠海市若干行业、企业与学院共建了教指委和专指委，建立专业规划建设协调机制和“双三元”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将行业规范、技术标准等纳入课程内容，并开展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师资及教学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为此，学院对接国家级重点战略性新型产业珠海新能源智能电网产业联盟，重点建设了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对接珠海的高端制造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重点建设了数控技术专业；对接珠海高端服务业，重点建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学院还先后与一百多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重点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实施专业与课程等项目改革，使学院的专业设置更加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当地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三是设立协同创新的高端研究平台，推动专业课程建设质量和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为优化专业设置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撑。

学院设立了广东省社科院珠海分院、中科院广州分院珠海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广州分院珠海基地三大高端研究平台带动科研。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学院课程建设“素质教育系统化、核心课程精品化、职业标准课程化、实训教学体系化、创业教育层次化、课改视野国际化”等理念的内涵。还通过内培外引、校企联合培养、双岗互聘等，打造了一支包括高校教师、相关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组成的高素质、专兼职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为优化专业设置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作者系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2016-04-19

**◆文化纵横**

**什么是好的通识教育**

**张亚群**

近年来，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推动我国通识教育迈向新阶段。四校通识课程模块分别有六大领域、八大课组、七大模块和四大板块，各校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数量占其通识课程总数的1/4左右，集中在人文学科。在政策层面，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提升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这些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目标和发展理念，对于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尽管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见解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通识教育既然是“教育”，必然与人的培养密不可分；况且，古今中外大量事实一再昭示，人的成长离不开通识教育。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技术类高校，除了培养大学生的不同专业才能外，还需要培育某些共同的基本素养。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大众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增多，办学目标各有侧重，但也面对诸多共性问题，如人生的意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家庭和社会之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等，这些都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人的培养来看，实施通识教育，关键在于培养什么样的“通识”以及如何培养“通识”。

一、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东西方文化演化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普遍要求。其源头，在中国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后演化为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在西方则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和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认同和赓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与英文“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相对应，中文语境的“通识教育”一词，虽属后起的概念，却与中华民族优良教育传统相契合，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识教育既反映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也折射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从文化传承和文明演进来看，通识教育之于中华文化，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交互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不辍，至今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其中以汉字为载体的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百年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预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他还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过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认为，经学教育“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其合理内核值得发扬光大。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大学教育整体上呈现明显的“西化”取向，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文化过程中，坚持中学与西学并重，极力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精神，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些学人重视学习国文和西文，具有深厚的国学和西学根底；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根本；重视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促进中西文化互补。

二、注重“学习”的教育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贯穿于“教”“学”双向活动和师生相互影响之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只有内化为学习主体的意识和自觉行为，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因此，好的通识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应是注重“学习”的教育。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种“学习”的文明，对于教育有独特而深邃的理解。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先秦儒家认为，“学”是第一位的，“教”是第二位的，“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篇都在讨论“学”，而不谈“教”。远方的朋友前来求教，共同探讨问题，不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你所说的道理，虽然他人没有理解，你却并不怨恨，这不是君子应有的学习态度吗？《学记》则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强调讨论式学习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源。此外，透过《礼记·学记》、荀子的《劝学》等教育名篇的命名，我们亦可见儒家重“学”之特质。

即使在全面移植西方学制的近代，中国人仍然保持了“好学”的传统。郭秉文指出：“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过去崇尚古代经典的文学及伦理，而今则扩展到西方科学的实验与致用，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借此可实现新国民和爱国的理念。”

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它需要通过身教，以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为师者首先要有“通识”，并努力营造民主的教学气氛。梅贻琦、潘光旦提出师生“从游”论，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作为教师，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而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从先贤倡导的“言教”“身教”，到当今兴起的“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教的形式千变万化，而“学”的本质则一以贯之，这就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即“做人”）和学会发展。这也是当今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应有的基本要求。

三、突破学科藩篱的教育

学科既是学术的分类，也是教学的科目，它构成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科的划分又具有相对性和人为性，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一的专业教育所能实现的。金耀基认为，“通识教育”这个称谓的提出，在学术越来越专门化，教育设计越来越狭窄之后才有意义。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取代专业教育，不如说是平衡专业教育。好的通识教育，应是开放、包容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通贯古今中外，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一般说来，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视野，“通”“专”结合，富有独立人格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提出清华大学的课程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任鸿隽认为，科学在教育上的价值，“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践，推动了近代创新人才的培养。

近代学术大师的成长之路，印证了通才教育的成功。钱伟长曾说：“我早年有幸接受了开放式的、适应性较强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使我受用终身。”他认为，“大学阶段的教育应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是在为终身学习做准备、打基础的。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能遨游各个知识领域并为我所用的人”。由此可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通识教育的拓展。

当今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质要求日益提升，个体要成功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多项才能。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日趋综合，大学教育更需注重通识基础，融合不同学科文化，才能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四、以经典、核心课程为载体的发展心智的教育

通识教育涵盖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实践三层面，以课堂教学为主要途径，辅以校园文化熏陶等隐性课程。好的通识教育，在课程实施上，大多通过经典传授和核心课程教学，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从守成到创新，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创新不是彻底断裂，而是具有延续性的变革；创新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生生不息。经典阅读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就在于经典常读常新，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之间，架起了人类智慧沟通的桥梁。美国核心文本与课程协会执行董事约瑟夫·斯科特·李指出，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与《论语》这类的世界经典，“它教导学生处处思考和感受人类关心的那些具有深刻意涵和基础性的事物，跨越众多的学科、文明和时代——不是简单地重现过去，而且也想象未来”。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普遍采用经典阅读、小班教学和讨论课的形式，并非偶然，而是与其传承文化精华、发展心智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的。如耶鲁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经典阅读核心课程，班级人数不超过17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也是如此。

推进大学通识教育，需融会中西教育之长。东方教育制度之于学生的长处在于它的标准性、严格性和整齐性，不足在于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西方教育制度之于学生的长处在于它的多样化、灵活性和实用性，不足在于它的过度功利与放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一些顶尖大学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领域已经能为学生提供世界领先的课程。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高校还存在差距，高等教育课程质量亟待提升。改善大学现有课程，迫切需要增加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核心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推动中外经典阅读，发挥其育人功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改善课程的考试评价和教学管理方式。

五、凝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非功利的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人文关怀、人格养成与价值观陶冶，是提升个体素养，凝聚社会共识的主要途径，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教育特征。通识教育内容广泛，而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内容。好的通识教育，乃是在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方面凝聚共识的教育，为社会和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通识教育的目标、内容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民族文化特征。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文化自觉；塑造共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是各级学校素质教育的共同目标，成为其他教育目标的基础。人的文化自觉作为受教育者的人文感悟和价值追求，是较高层次的教育目标。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在前两个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形成的群体价值取向，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代表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些基本内容成为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导向。

增强社会凝聚力，首先，需注重国情教育。知不足才能谋发展，凝聚共识才能形成合力。其次，加强民族和谐教育。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感悟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和谐团结，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再次，加强民主与法治教育。民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它受文化传统、教育发展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在实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实现民主需要法治保障。最后，重视诚信教育，建立和完善诚信社会保障体系，营造守信和睦的社会环境。

总之，良好的通识教育，立足于民族文化之根，适应本国发展的需要，是学习者通向成功之路。完善大学通识教育，迫切需要变革教育教学方式，开发和优化课程资源，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这样的通识教育，对于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和知识结构，培养创新人才，凝聚社会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为重要。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2016-05-10